

橘詩和橘史

——北宋陳舜俞《山中詠橘長詠》研讀

曾雄生 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

摘要:《山中詠橘長詠》是北宋陳舜俞所作的一首詠橘長詩。詩中以詩句加注的方式,詳細地介紹太湖洞庭山一帶的柑橘產銷情況,內容涉及地理環境、產量品質、採收日期、種接技術、種苗來源、品種分類、橘園開闢、病蟲防治、修剪培植、灌溉施肥、民俗民風、收貯加工、運銷饋送等諸多方面。本文首次從柑橘栽培史的角度予以研讀,並將其與南宋韓彥直所著《永嘉橘錄》進行比較,對其中所涉及的一些技術演進加以解釋。認為生長於橘鄉的陳舜俞,以其對柑橘的瞭解,所作之《長詠》,不僅早於《橘錄》百年有餘,某些內容和《橘錄》相比也有過人之處。《長詠》是《橘錄》之前中國柑橘史上的重要文獻,它標誌著中國傳統柑橘栽培技術的成型,然而前者在歷史上的影響却遠不及後者。本文亦嘗試從體裁和體量上對個中原因進行了分析。

關鍵詞: 山中詠橘長詠 陳舜俞 橘錄 韓彥直

1 從《永嘉橘錄》說起

說起中國橘史,或中國歷史上有關柑橘栽培的文獻,最爲人所熟知的莫過於《永嘉橘錄》(以下簡稱《橘錄》)。該書是南宋淳熙五年(1178年)由韓彥直所著,被研究者稱爲“世界上最早的一部柑橘專著”。^①在世界柑橘栽培史上具有重要的歷史地位和影響。《四庫總目》所作提要指出,“是錄亦頗見條理”,內容“皆詳贍可觀”。李約瑟認爲,“直至1500年,即三個多世紀以後才出現了可以與韓彥

DOI: 10.5404/jjzhou.2011.30.07

本文受中國科學院自然科學史研究所“科技知識的創新與傳播”重大項目資助。本文完成之後,曾請浙江省柑橘研究所研究員、副所長徐建國先生審讀,並提出寶貴意見。在此表示感謝。

① (宋)韓彥直撰,彭世獎校注:《橘錄校注·前言》,北京:中國農業出版社,2010,頁1。

直的著作相匹敵的著作”。^①國內學者在比較了《橘錄》和其他幾部相類似的著作，如《荔枝譜》、《牡丹譜》及《芍藥譜》之後，甚至認為《橘錄》幾乎是“空前絕後的唯一的柑橘專譜”。^②

但在諸多好評之下，我們也不得不客觀地指出，韓彥直對柑橘的瞭解其實有限。韓彥直是陝北延安人，那是一個不產橘的地方。他曾吃過橘子，但未曾見過橘樹。他在《橘錄·序》中如是說：

予北人，平生恨不得見橘著花，然嘗從橘舟市橘，亦未見佳者，又安得所謂泥山者啖之？去年秋，把麾此來，得一親見花而再食其實，以為幸。獨故事：太守不得出城從遠遊。無因領客入泥山香林中，泛酒其下，而客乃有遺予泥山者，且曰：橘之美當，不減荔子，荔子今有譜，得與牡丹、芍藥花譜並行，而獨未有譜橘者，子愛橘甚，橘若有待於子，不可以辭。予因為之譜。且妄欲自附於歐陽公、蔡公之後，亦有以表見溫之學者，足以夸天下，而不獨在夫橘爾。^③

從這段自述來看，韓是到了溫州之後才有機會與柑橘親密接觸，但由於客觀條件和規章制度限制，他在寫作《橘錄》之前，只見過一次橘樹開花，吃過兩次橘子，沒有進過橘園，只是在品嚐過客人贈送的泥山橘子之後，受人之托，附庸風雅，於是作橘譜。他推泥山乳柑為第一，顯然是“吃人家的嘴短”。其後陳景沂作《全芳備祖》引《橘錄》，對其書中推泥山乳柑為天下第一之說，不以為然，謂“韓但知乳柑出於泥山，獨不知出於天臺之黃巖也。出於泥山者固奇，出於黃巖者尤天下之奇也”，^④云云。南宋時，黃巖柑的確有勝過溫州柑的說法。陳亮在給朱熹的信中就提到：“柑子一奩，內有真柑五十枚，乃是黃巖柑，聞其味頗勝溫州者。”^⑤雖然陳景沂批韓彥直有“夸飾土產”^⑥之嫌，因其家本天臺，但韓彥直對柑橘的瞭解有限，於此也可略見一斑。在對柑橘瞭解不多的情況下，韓為了寫作《橘錄》也翻閱過一些文獻，做過些調查，但終究有不到之處。下面所要介紹的

- ① [英]李約瑟：《中國科學技術史》第六卷，第三十八章，中譯本，北京：科學出版社，2006，頁320。
 ② 韓彥直撰，彭世獎校注：《橘錄校注·前言》，頁2。
 ③ 《橘錄校注》，頁2。
 ④ 陳景沂：《全芳備祖》，北京：農業出版社，1982，頁913。
 ⑤ 陳亮：《龍川集》卷二十《與朱元晦秘書》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綫裝書局，2004，頁619。
 ⑥ 永瑤：《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百十五“譜錄類”，海口：海南出版社，1999，頁600。

《山中詠橘長詠》就似未曾入過他的法眼。由是該詩也未能經由韓彥直的推廣為更多的人所熟悉，後人更無由得知此前柑橘栽培的情況，以至於錯誤地認為關於柑橘的系統記述是從《橘錄》開始。

2 《山中詠橘長詠》及作者

《山中詠橘長詠》(以下簡稱《長詠》)是北宋陳舜俞所作的一首詠橘長詩。詩中以詩句加注的方式，詳細地介紹太湖洞庭山一帶的柑橘產銷情況，內容涉及地理環境、產量品質、採收日期、種接技術、種苗來源、品種分類、橘園開關、病蟲防治、修剪培植、灌溉施肥、民俗民風、收貯加工、運銷饋送等許多方面。某些內容和《橘錄》相比，不僅早出，且為後者所不及。茲鈔錄如下：

包橘古云美，揚州地所宜。名從夏后貢，^①頌見楚人辭。^②雲夢分膏沃
 (《呂氏春秋》云：果之美者，有雲夢之柚)，璇星散陸離(《春秋運斗樞》云：璇星散為橘)。洞庭仙壤接(《水經》云：震澤包山，林屋洞天，與洞庭湖相通[一作近]，故震澤山中亦有洞庭之名)，震澤水煙披(一作被)。柚酢徒然早，柑黃豈厭遲。封君千戶等，老圃(一作園)萬奴隨。秀萼瑤瓊綴，青陰惺惺垂。朱衣霜傅採，素裹露含滋。弱幹金丸重，繁條火齊累。瓜生先作瓣，蠶老不成絲。爽味鍾寒律，殷姿照夕曦。清香掩蘭杜，真液賤楂梨。揀選收藏日(採橘日以冬至前二十日為候。凡得霜後及有西北風後，天色晴霽時，則家家採而藏之，無過冬至前十日者。過則為寒所損，亦損明年樹矣)，辛勤種接時。壤須來處美(樹皆用小舟買於蘇、湖、秀三州，得於湖州者為上，亦莫能語其由也)，移怕樹同知(《齊民要術》云：移樹無時，莫令樹知)，朱綠爭珍旨(有朱橘，有綠橘)，荆湘辨等差(橘有荆南種，有湘州皮者)。蹊深比桃靜(一無纖草，爽潔成蹊)，歲晚與松期(歲寒不凋)。壇甃龜龜石(種樹傳山為級，以石砌之，龜、龜二山在太湖中)，園栽(一作栽)枳棘籬。討蟲煩鑽鑿(樹有蟲則實不蕃，春夏用小鑽鑿取而殺之，謂之討蟲)，科冗付蒸炊(採橘後，即芟去小枝不能結實者，謂之科樹)。

① 《尚書·禹貢》：“厥包橘柚錫貢。”

② 指屈原的《橘頌》。

穿井防天旱(橘樹夏遭旱,則冬不耐寒而死。人家皆鑿井於樹旁,貴負荷之近也。熙寧七年大旱,井泉竭,山中擔湖水澆樹,有一家費十萬錢雇人者),禳瘟甚歲饑(橘忽有堅小而青黑者,謂之青瘟、黑瘟,往往祝祭禳祈焉)。向陽刪密葉(橘得日則色亦深而味甘),伐木樹低枝(橘繁則樹枝爲之折)。有義曾分客(山中橘熟時見客來者,無不爲贈),無偷不禁兒(小兒習見厭食,不復爲偷)。牦(普高切)嫌連雨長(雨多則皮虛而大,不可久藏,謂之牦也),老要勁風吹(見上注)。滿把留長蒂(採橘必留枝蒂,成一握三指,所以養橘。否則易乾),盈箱藉短茨(破竹爲籠,藉用短茨)。入倉寧愧稻,出汗僅同醫(採橘先制地板上,堆之數日,謂之入倉。微覆用草,使汗出,然後入籠,謂之出汗。否則味酢)。雅俗傳珍惜,深林或棄遺。稍收先落子(橘生花至繁,初結實多落,收之堪淹藏,爲藥橘),爭曬已殘皮(山中人言:東、西兩山賣乾橘皮,歲不下五六千秤)。趁市商船急,充庭使驛馳。公筵薦魁磊,內合送瑰奇(貢柑有徑圍之限,大者不敢以進,慮不可常也。唯官府公筵,負擔至京師,賣之貴家,最爲大矣)。寄遠曾非選(寄惠遠,惟未甚熟而小者,乃不壞;既黃而大者,不能久矣),熏藏品最卑(橘之小者,謂之脚橘。山中作土窖,熏用煙而收之,謂之熏橘)。善生惟計畝(種橘大姓,不復計樹若干,但云有幾畝),視價旋論賞(每一百斤爲一籠,或得價籠一千五百錢,下價或六七百,不可常也)。薄探酬春(一作來)賞,精嘗侑舉卮。他年修果譜,應載野人詩。^①

陳舜俞(1026—1076),字令舉,湖州烏程(今浙江湖州)人。仁宗慶曆六年(1046年)乙科進士,時年當爲二十一歲。^②嘉祐四年(1059年),取制科第一,舉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授著作佐郎、簽書忠正軍節度判官公事。授簽書壽州判官公事,充明州觀察推官、浙江天臺從事。與歐陽修、蘇東坡、司馬光交往甚厚,而與王安石似有不睦。神宗熙寧三年(1070年),以屯田員外郎,知山陰縣,拒行青苗法,降監南康軍酒稅。熙寧七年(1074年)王安石罷相後,又獲起用,不久又

① 陳舜俞:《山中詠橘長詠》,收入《都官集》卷十四,四川大學古籍整理研究所編:《宋集珍本叢刊》,北京:綫裝書局,2004,頁190—191。北京大學古文獻研究所編:《全宋詩》卷四零四,第8冊,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2,頁4974。

② 《都官集》卷十二《楓橘》詩云“二十送上鄉老書”,“明年偶中崇政第”。則其慶曆六年(1046年)進士及第時年21歲,逆推當生於天聖四年(1026年)。

罷，幾度棄官隱居於嘉興清風涇白牛村，自稱“白牛居士”。熙寧九年(1076年)，卒。^①有《都官集》。蘇東坡對他贊賞有加，“學術才能，兼百人之器”。^②

陳舜俞生活的湖州、嘉興所在的太湖周邊地區，屬《禹貢》揚州之域，是歷史著名的柑橘產地，“厥苞橘柚錫貢”。其中尤以太湖洞庭山出產的柑橘最為有名。唐時吳中出產的洞庭橘已成皇家貢品。唐人康駢的筆記小說《劇談錄》提到“吳中初進洞庭橘子”。唐代亦有不少詩篇歌詠過該產區的柑橘。如張籍的詩，“江南人家多橘樹，吳姬舟上織白紵”。杜荀鶴的詩，“去越從吳過，吳疆與越連。有園多種橘，無水不生蓮”。其中以白居易、周元範、張彤關於“揀貢橘”的唱和詩最為突出。詩中對橘樹生長環境、橘子成熟時節、橘果豐收及其馨香怡人之情景，作了生動描述與詠讚，趣味盎然。唐人關於太湖地區柑橘的詩中除有“貢橘”之外，便是“霜橘”，因柑橘大多要到霜降前後成熟，所以詩人常將霜與橘聯繫在一起，如劉長卿的“木落姑蘇臺，霜收洞庭橘”。^③其中又以韋蘇州(韋應物)的《答鄭騎曹青橘絕句》“書後欲題三百顆，洞庭須待滿林霜”最為有名。^④唐時本地的詩人，如陸龜蒙等，對柑橘也多有吟詠。在皮日休與陸龜蒙的唱和詩中，就有他們在早春以洞庭橘贈答的詩作。從皮日休“個個和枝葉捧鮮”到陸龜蒙“到春猶作九秋鮮”^⑤的詩句來看，當時的果品保鮮技術已達到很高的水平，也從一側面反映了柑橘種植技術的發達。陸龜蒙還對柑橘害蟲中的中華鳳蝶的幼蟲有詳細的觀察，作有《蠹化》一文。

陳舜俞生活的北宋中前期，以洞庭山為中心的太湖地區，柑橘種植業仍然是當地的優勢產業。曾閒居蘇州的蘇子美(1008—1048年)說：“予觀震澤，受三江吞嚙，四郡之封，其中山之名見圖志者七十有二，惟洞庭稱雄其間，地占三鄉，戶

① 陳舜俞的卒年有多種說法，一說卒於熙寧八年(1075年)，一說九年，一說卒於元豐(1078—1085年)中。比較可靠的是熙寧九年或以後，因為現在可以看到的文獻證明，熙寧八年十二月五日還寫過《鐔津明教大師行業記》(石刻本在杭靈隱山)，收入《鐔津文集》。又熙寧三年(1070年)，陳不行青苗法，被貶監南康軍酒稅，“越五年而卒”(《長編》卷212、《宋史·張問傳附傳》)。則應卒於熙寧九年(1076年)。《蘇軾文集》卷六十三《祭陳令舉文》稱：“予與令舉別二年而令舉沒。”考熙寧七年(1074年)，時任杭州守、倅的楊繪、蘇軾同時離任，陳舜俞等同舟送行，則二年後，亦1076年無疑。陳之生卒應補正為：1026—1076年。

② 脫脫：《宋史》，卷三百三十一《張問傳，陳舜俞、樂京、劉蒙附》北京：中華書局，1977，頁10664。

③ 信者仲君：《劉長卿詩編年箋注》，《吳中聞潼關失守因奉寄淮南蕭判官》，北京：中華書局，1996，頁103。

④ 韋應物：《答鄭騎曹青橘絕句》，《韋應物集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頁343。

⑤ 皮日休：《松陵集》卷六，《四庫全書》，第1332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頁234。

率三千，環四十里，民俗真樸，歷歲未嘗有訴訟至於縣吏之庭下，皆以樹桑梔甘柚為常產，每秋高霜餘，丹苞朱實，與長鬆茂樹，相差間於巖壑間，望之若圖繪。”^①張耒有“洞庭橘熟千林”^②的詩句，可以想見當時柑橘種植的規模。北宋時梅堯臣所作《送張子野知虢州先歸湖州》詩中也有“吳興近洞庭，橘林正吹花，君當橘柚時，摘包帶霜華”^③這樣的一些詩句。洞庭產柑橘除用於鮮食之外，還用於釀酒。蘇軾作《洞庭春色賦》，引言中提到“安定郡王以黃柑釀酒，名之曰洞庭春色”。更多的還是販運到四方銷售。當時流傳有這樣的俗語：“左販洞庭橘，右擔彭蠡魚。”^④品嚐過洞庭橘的人們總是對其美味念念不忘，風諸詩句，如“我思洞庭橘，赤金三寸圓，磊落火齊珠，綴樹團紫煙”。^⑤“常思洞庭橘，美實冠南方，雪蘂千林謝，金衣萬頃黃”。^⑥

陳舜俞的詩中對於洞庭山的柑橘生產的盛況也多有描繪。如“封君千戶等，老圃萬奴隨”，雖然是引述《史記·貨殖列傳》、《襄陽記》等史籍中的典故，但也可以想見當地產橘之盛；詩注中還给出了一些數字，如“東、西兩山賣乾橘皮，歲不下五六千秤”。乾橘皮是鮮果食用之後所遺下的經晾曬脫水之後的果皮，又名殘皮、陳皮，入藥可理氣、化痰、燥濕的功效，主治胸腹脹滿、嘔吐、咳嗽痰多等症，具有很高的藥用和經濟價值。唐人有詩言：“識得尋常病，便須用橘皮。”^⑦收曬橘皮出售也成為橘農的收入來源之一。至今橘鄉的百姓仍然有在食用鮮橘後，收集橘皮、曬乾出售的習慣。500克的橘約可生產100克鮮橘皮，晾曬之後，約為50克乾橘皮。十五斤為一秤。6000秤乾橘皮還原成鮮橘子約為 $6000 \times 15 \times 5 = 450000$ 斤，這只是當地百姓自己消費的柑橘數量，又以蘇子美提到的三千戶，每戶按五口之家計算，洞庭山有人口約15000人，則人均柑橘消費量為30斤。實際當地生產的柑橘除自產自銷之外，還有大量外銷。當地的一些種橘大戶，收摘之後大量批發上市。這些“種橘大姓，不復計樹若干，但云有幾畝”，詩中

① 蘇舜欽：《蘇學士集》卷十三《蘇州洞庭山水月禪院記》，《四庫全書》，第1092冊，頁92。
 ② 張耒：《柯山集》卷二十八《次韻無咎戲贈兼呈同舍諸公輔》，《四庫全書》，第1115冊，頁239。
 ③ 梅堯臣：《宛陵先生文集》卷二十一《送張子野知虢州先歸湖州》，《宋集珍本叢刊》，頁668。
 ④ 黃庭堅：《黃庭堅詩集注》卷八《崇陽道中》，北京：中華書局，2003，頁644。
 ⑤ 鄭獬：《鄭溪集》卷二十三《感秋六首》，《宋集珍本叢刊》，頁208。
 ⑥ 章驥：《錢塘集》卷六《和庭橘》，《四庫全書》，第1097冊，頁495。
 ⑦ 徐成：《王良百一歌·起卧·五》，陳尚君輯校：《全唐詩補編》卷六十，北京：中華書局，1992，頁1750。

提到“熙寧七年(1074年)大旱,井泉竭,山中擔湖水澆樹,有一家費十萬錢僱人者”,也從一個側面反映了當時柑橘生產的規模。採摘上市的時候,“每一百斤爲一籠”,價格隨行就市,“或得價籠一千五百錢,下價或六七百,不可常也”。橘子的價格大致是當時稻米價格的一至二倍。可見當時當地柑橘商品化程度之高。陳舜俞的詩詳細地介紹了柑橘栽培技術(詳後),還涉及橘鄉民俗,提到“山中橘熟時見客來者,無不爲贈”。由於家家產橘,“小兒習見厭食,不復爲偷”,因此“無偷不禁兒”。“瓜田李下”,偷盜是傳統社會中影響瓜果類作物種植的主要因素之一。就筆者的親身經歷而言,即便是在人民公社的年代,每當柑橘等瓜果成熟時,都要派公認爲作風正派的老年社員輪流看守,以防偷盜。在看守不過來的情況下,人們往往會棄種一些容易引發偷盜的作物。另一個方面便是力爭使種植達到一定的規模。陳舜俞提到的情況顯然係後一種。

陳舜俞生長在橘鄉,對於柑橘的瞭解和韓彥直相比自是遠勝一籌。詩中提到,山中所種的橘樹苗,“皆用小舟買於蘇、湖、秀三州,得於湖州者爲上”,又提到“橘繁則樹枝爲之折”,需要伐木對下部的樹枝進行支撐,所謂“伐木樹低枝”。這些細節非本地人是難以知曉的。又如前面提到,洞庭山一帶的柑橘在唐時已成皇家貢品,作爲貢品的柑橘必須經過嚴格的挑選,果型的大小有嚴格的規定,這應跟筆者在人民公社時期在橘鄉老家所看到的情形是一樣的。當年每當十一月初柑橘下樹之後,各生產小隊就要派人到生產大隊集中起來,一般以婦女爲多,對柑橘進行挑選,挑選時要用到一重要的工具,即選格,選格由一薄板制成,選格上有按直徑大小順序排列的圓孔,以便選出大小相同的橘子,分類包裝,用於外銷。這個過程,在唐人詩中稱之爲“揀”。陳舜俞的詩則給出了一個細節,即揀出來充當貢品的橘子並不是個頭最大的橘子,個頭最大的橘子往往賣給了所謂“貴家”。陳舜俞在詩注中解釋了其中的原因,他說:“貢柑有徑圍之限,大者不敢以進,慮不可常也,唯官府公筵負擔至京師,賣之貴家,最爲大矣。”只有生長在橘鄉的人才會對橘事有如此細緻的瞭解。《橘錄》中就不見有此類的內容。

除詠橘詩以外,陳舜俞的其他詩文中也多處提到過柑橘,也反映了作者對於柑橘的熟稔。如在一首名爲《山中寄姑蘇守倅》的詩中就提到“莫釐山頭萬家橘”。^①這裏

① 陳舜俞:《都官集》卷十三,頁188。

的山和《山中詠橘長詠》的山都指的是太湖洞庭東山，其主峰便是莫釐山。他也曾“以橘贈湖州李公擇”。^①

陳舜俞和韓彥直有一共同之處是都擔任過屯田員外郎。這可能是他們重視農業相關事務的原因。陳舜俞有《說農》一文，採用古今對比方式，極言農民負擔之重，認為“農之困未有甚於今也”。^②從他的交友和作為來看，他顯然對當時正在極力推行的王安石變法不滿，也因此而遭到打擊和排斥。他的命運也隨王安石的沉浮而起落。他的詩作多為謫後隱居所作，所以又謙稱為“野人詩”。《長詠》詩提到“熙寧七年(1074年)大旱”事，顯係晚年所作。從寫作的年代上說要早出韓《橘錄》(淳熙五年，1178年成書)一百年以上。

陳舜俞作《長詠》之前，他的師友歐陽修等掀起了一股譜錄類著作的寫作風氣，以一種或多種園藝作物，如花卉、果樹等為對象，記載其品種、分類、品級及得名由來等相關的文化風俗、掌故、栽培護養方法等。如歐陽修的《洛陽牡丹記》(1031年)，蔡襄的《茶錄》(成書於1049年至1054年之間)和《荔枝譜》(1059年)，劉攽的《芍藥譜》(1073年)等。韓彥直《橘錄》的寫作就明顯受到這些著作的影響，理由是“橘之美當不減荔子，荔子今有譜，得與牡丹、芍藥花譜並行，而獨未有譜橘者。……因為之譜，且妄欲自附於歐陽公、蔡公之後，亦有以表見溫之學者足以夸天下，而不獨在夫橘爾”。^③《橘錄》的寫法也有模仿《洛陽牡丹記》的痕跡。陳舜俞也應讀到過歐陽修等人的譜錄類著作，這類著作大多是在送往酬答中完成的，但陳舜俞認為，寫作柑橘譜錄的時機尚未成熟，因此，先寫了一首長詠，並在長詠的結尾處寫道：“薄探酬春賞，精嘗侑舉卮，他年修果譜，應載野人詩。”

3 《山中詠橘長詠》所載柑橘栽培技術

韓彥直的《橘錄》之所以受到關注，是因為它比較完整而系統地敘述了永嘉柑橘類果樹的品種，總結了柑橘栽培技術、病蟲防治、採摘貯藏和加工製造等方面的知識。其實，在它之前一百年的《長詠》已涉及其中絕大部分的內容，有的甚

① 陳舜俞，《都官集》卷十三，頁181。

② 陳舜俞，《都官集》卷七《說農》，頁126。

③ 《橘錄校注》，頁2

至有過之而無不及。從篇幅而言,《橘錄》長約 3 400 餘字,但三分之二用於記載柑橘品種,真正描述栽培技術的文字僅 1 075 字,而《長詠》加上原注也有近千字(912 字)。《長詠》代表了十一世紀柑橘生產中心太湖洞庭山的情況,而《橘錄》則代表了十二世紀的柑橘生產中心溫州一帶的情況。茲將二者依《橘錄》所列項目,逐一進行比較。

3.0 品種

《橘錄》卷上和卷中記述柑橘類果樹的品種。該書序中說:“橘出溫郡,最多種。柑乃其別種。柑自別為八種,橘又自別為十四種,橙子之屬類橘者又自別為五種,合二十有七種。”^①上、中兩卷分別對各種品名的柑、橘、橙,注意從樹冠形狀、枝葉生長狀態、果實形狀及大小、果皮色澤及糙滑、果皮剝離難易、瓢囊的數目、品味特點、種子多少、果實成熟期的早遲、種植適應地區等作了詳細的描述。其中上卷柑有 8 種:真柑(又名乳柑)、生枝柑、海紅柑、洞庭柑、朱柑、金柑、木柑、甜柑;下卷橘分 14 種:黃橘、塌橘、包橘、綿橘、沙橘、荔枝橘、軟條穿橘、油橘、綠橘、乳橘、金橘、自然橘、早黃橘、凍橘。反映了當時對柑橘類果樹觀察、研究的細緻。

重視品種的這一寫法延續了宋人譜錄類著作的特點。這是《長詠》所不及的地方。《長詠》中只提到,“朱綠爭珍旨(有朱橘,有綠橘),荆湘辨等差(橘有荆南種,有湘州皮者)”。但這條簡短的記載却透露出一些重要的信息,一是以果皮顏色作為劃分品種的重要依據由來已久。果實的顏色是最直觀的。蘇軾《贈劉景文》詩:“一年好景君須記,最是橙黃橘綠時。”柑橘成熟時大多呈紅、黃二色。洞庭山有種橘子在成熟之後,仍然保持深綠色。范成大(1126—1193 年)《吳郡志》中有關橘的記載:“綠橘出洞庭東西山,比常橘特大,未霜深綠色,臍間一點先黃,味已全可噉,故名綠橘。”^②毫無疑問的是,綠橘這一品種在南宋時溫州橫陽一帶已有少量種植。二是洞庭山一帶柑橘品種來源。《橘錄》卷上有“洞庭柑”一種,指明“洞庭柑,皮細而味美,比之他柑,韻稍不及,熟最早,藏之至來歲之春,其色如丹,鄉人謂其種自洞庭山來,故以得名”。^③太湖洞庭山一帶雖然是老橘區,但

① 《橘錄校注》,頁 1。

② 范成大,《吳郡志》卷三十,臺灣:成文出版社,1970,頁 902—903。

③ 《橘錄校注》,頁 8。

它和其上游的洞庭湖老橘區存在品種資源上的交流，故在太湖橘區有所謂“荆南種”和“湘州皮”的劃分。《長詠》關於柑橘品種的記載構成了一個完整的品種傳播鏈，這就是由洞庭湖到洞庭山，再到溫州的傳播路線。

3.1 種治

《長詠》可跟《橘錄》相比較的地方主要在於栽培技術部分，即《橘錄》卷下的內容。《橘錄》卷下將柑橘技術分為：種治、始栽、培植、去病、澆灌、採摘、收藏、制治、入藥等項。這些項目在《長詠》中幾乎都有涉及，此前學者認為，《橘錄》中若干柑橘栽培技術和經驗是第一次見於文獻記載的，現在看來當重新檢討。

“種治”講的是針對溫州的自然條件對柑橘栽培所涉及的主要技術環節，包括土壤、地勢選擇、整地、種植密度、除草、施肥等。認為“斥鹵”、“涂泥”的土壤適宜柑橘種植，只是要做好開溝排水。對於種植和管理都有一些量化指標，如株距為七、八尺，鋤草四次，施肥冬夏各一次。

洞庭山和溫州一道，屬《禹貢》揚州之域，土性涂泥，特殊的山水環境使其成為柑橘之鄉。故《長詠》中提到了“包橘古云美，揚州地所宜，……洞庭仙壤接，震澤水菸披”。據北宋龐元英《文昌雜錄》載“洞庭四面皆水也，水氣上騰，尤能辟霜，所以洞庭柑橘最佳”的敘述，^①那是指受太湖環繞的關係。在南方山區由於寒冷不能栽種柑橘，人們則修築池塘，利用水汽的作用抗拒霜雪，發展橘柚種植，這應是一項可貴的創造。淳熙《新安志·物產》中就說：“大率山寒不宜橘柚種者築池中為交午之道，列植其之，水氣四面薄之，則不畏霜雪。”^②而這可能正是受到太湖洞庭山柑橘種植的啟發。

不過《長詠》和《橘錄》相比，似乎更注重橘園的建設和栽種之後的中耕除草。《長詠》提到，“壇鶖龜鼉石（種樹傅山為級，以石砌之，龜鼉二山在太湖中），園栽枳棘籬”。這很容易使人想起宋朝以後，在南方地區廣泛出現的梯田。據南宋范成大《騷鸞錄》在江西袁州（今宜春）“嶺阪上皆禾田，層層而上至頂，名梯田”。這是有關“梯田”一詞的最早記載。禾田即稻田。梯田主要是用於種植水稻。但從

① 龐元英：《文昌雜錄》卷四，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35。

② 羅願：《淳熙新安志》卷二《物產》，《四庫全書》，第485冊，頁365。

《長詠》的記載來看，北宋時，洞庭山人已將梯田修造技術用之於柑橘種植。梯田橘園除使石頭砌築外，還在四周栽種枳棘圍護，以防止閒雜人等隨意進出。比種稻的梯田更為講究。這是《橘錄》所沒有的內容。在橘園管理方面，《長詠》提到“蹊深比桃靜（一無纖草，爽潔成蹊）”，這應該是辛勤維護及中耕鋤草的結果。

南宋初年的文學家葉夢得對於洞庭山柑橘種植何以強調中耕除草、何以要傅山為級進行了解釋。原來這一切都與橘園的精耕細作、防止草害及凍害有關。他說：“凡橘一畝，比田一畝利數倍，而培治之功亦數倍於田，橘下之土，幾於用篩，未嘗少以瓦甃雜之；田自種至刈，不過一二耘，而橘終歲耘無時，不使見纖草；地必面南，為屬級，次第使受日；每歲大寒，則於上風焚糞壤以溫之。吾不如老圃，信有之矣。”^①

3.2 始栽

《橘錄》“始栽”一節的重點內容是嫁接。柑橘的生長期較為漫長，有“橘不可待”^②之說，范成大曾手植綠橘、枇杷，皆森然出屋。枇杷已着子，橘獨十年不花。^③因此，早產豐產是柑橘栽培的目標。這一追求隨着嫁接技術的使用而得以實現，從而也促進了柑橘產業的發展。

《橘錄》中記載了兩種柑橘的繁殖方式。一是采用種子繁殖的所謂“自然橘”：“自然橘，謂以橘子下種，待其長，歷十年始作花結實。味甚美，由其本性自然，不雜之人為，故其味全。”^④另外還有朱柑，“不用接而成”。^⑤二是嫁接繁殖。中國的嫁接技術在漢代已出現。《齊民要術》、《四時纂要》等古農書對梨、柿、林檎、栗等的嫁接技術進行過總結。宋以後這一技術開始廣泛用於柑橘栽培。《橘錄》提到，除朱柑和自然橘外，“蓋他柑與橘，必以柑淡子着土，俟其婆婆作樹，以枝接之，為柑，為橘，為多種，俱非天也”。《始栽》一節具體敘述了種植朱欒核為砧木，經移栽，長至木大如小兒拳，遇春才嫁接，接穗要選柑之佳、橘之美者，經年

① 葉夢得：《避暑錄話》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91。

② (宋)朱弁：《曲洧舊聞》卷三：“果中易生者莫如桃，而結實遲者莫如橘。諺云：‘頭有二毛好種桃，立不逾膝好種橘。’蓋言桃可待，橘不可待。”朱弁：《曲洧舊聞》卷三，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127。

③ 范成大：《石湖詩集》卷一《兩木·並序》，《四庫全書》，第1159冊，頁602。

④ 《橘錄校注》，頁17。

⑤ 《橘錄校注》，頁9。

向陽的枝條，將砧木留一尺多高，其餘截去。然後用皮接法嫁接，接後還要包扎保護，以防雨淋，特別提到能工巧匠、人力有參於造化的重要。大多數農學史著作都認為，柑橘採用嫁接繁殖，也是《橘錄》首先記載。實際上，《長詠》雖然沒有對嫁接技術展開詳細的討論，但卻明確地提到這嫁接繁殖的事實，因為詩中有“辛勤種接時”一語，說明至少在《橘錄》成書百年之前，已存在柑橘嫁接的事實。

不過，《長詠》似乎對移栽更為重視，因為洞庭山當地柑橘種植所需要的種苗，“皆用小舟買於蘇、湖、秀三州，得於湖州者為上”，這說明當時洞庭山周邊地區都有柑橘生產，且出現了一定程度的專業化趨勢。如何提高種苗的成活率，成為洞庭山柑橘種植的關鍵，《長詠》提出“壤須來處美，移怕樹同知”，這正是《齊民要術》以來在樹木移栽方面所採用的經驗，即“移樹無時，莫令樹知，多留宿土，記取南枝”的概括。

3.3 培植

《橘錄》中主張剪去主根，在樹高二三尺時，“剪其最下命根，以瓦片抵之，安於土，雜以肥泥，實築之”^①，書中還提到命根不斷會影響到枝葉不茂。《長詠》不見類似內容，可能是當時洞庭山一帶的柑橘栽培尚沒有採用此種培植方法。但在陳旉《農書》中却見有類似內容，陳旉《農書》是論述江南地區農業生產技術的農書，書中主要內容涉及水稻、養牛和蠶桑，不涉及柑橘種植。該書所載種桑之法提到桑園整地妥當：“然後取起所種之苗，就根頭盡削去幹，只留根，又削去對幹一條直下者命根，只留四傍根。每三根合作一株，若品字樣，繫縛着一竹筒底下。”^②陳旉生於北宋熙寧九年（1076年），即陳舜俞死後的第二年，《農書》成書於南宋紹興十九年（1149年），時陳旉已七十有四歲，而《橘錄》成書於1178年，於此可見，這種用於樹木移栽的所謂“命根”處理技術是在陳舜俞死後才出現的。

3.4 去病

柑橘的病蟲害較為嚴重，古人多有領教。唐人杜甫《病橘》一詩，提到因病蟲

① 《橘錄校注》，頁24。

② 陳旉：《農書》卷下《種桑之法篇第一》，北京：中華書局，1985，頁20。

害及霜雪凍害，導致“群橘少生意”，嚴重影響柑橘的產量和品質。唐人陸龜蒙則對柑橘蟲害（橘蠹）有細緻的描述。^①現代學者據其描述推斷，橘蠹當屬為害柑橘最普遍的中華鳳蝶的幼蟲。也可能是天牛類或吉丁蟲類。陸是湖州人，和陳是同鄉，當指同一種為害柑橘的害蟲。

在與柑橘病蟲害的鬥爭過程中，古人也積累了豐富的經驗。其中最著名的莫過於以蟲治蟲的生物防治。唐人王旻《山居要術》“種橘法”條中有關於柑橘樹害蟲生物防治的記載：“柑樹為蟲所食，取蟻窩於其上，則蟲自去。”^②以前學者注意到《南方草木狀》中有關黃猱蟻防治柑橘害蟲的記載，且認為《南方草木狀》是晉代嵇含所作，因此認為是此類記載最早的，但現在學者多以為《南方草木狀》是宋代人所作。因此，《山居要術》中的記載當為最早的。不過宋人的記載更為詳細：“廣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種柑橘以圖利。常患心蟲損食其實，惟樹多蟻，則蟲不能生，故園戶之家，買蟻於人。遂有收蟻而販者，用豬羊脬盛脂其中，張口置蟻穴傍，俟蟻入中，則持之而去，謂之‘養柑蟻’。”^③宋人還發現，螞蟻雖然可以治蟲養柑，但也並非所有的螞蟻對於柑橘來說都是益蟲。在廣西梧州民間就流傳有這樣的說法：“郡中柑橘多被黑蟻所食。人家買黃蟻投於樹上，因相鬥，黑蟻死，柑橘遂成。”^④

但對付橘蠹的生物防治方法似乎在宋時還僅見於嶺南地區，位於長江下游地區的江浙一帶並無類似記載。《橘錄》中指出：“木之病有二，蘚與蠹是也。樹稍久，則枝干之上苔蘚生焉，一不去，則蔓衍日滋，木之膏液蔭蘚而不及木，故枝干老而枯，善圃者用鐵器時刮去之，刪其繁枝之不能華實者，以通風日，以長新枝。木間時有蛀屑流出，則有蟲蠹之相，視其穴，以物鈎索之，則蟲無所容，仍以真杉木作釘，窒其處，不然則木心受病，日以枝葉自凋，異時作實，瓣間亦有蟲食。柑橘每先時而黃者，皆其受病於中，治之以早乃可。”^⑤提出以刮削和整枝的方式治理苔蘚之病，以鈎索、木釘治蠹蟲。

① 陸龜蒙：《笠澤叢書》卷二《蠹化》、《四庫全書》，第1083冊，頁248。

② 王旻：《山居要術》，引自朝鮮刻本影印《居家必用事類全集》，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88，頁114。

③ 莊綽：《鷄肋編》卷下，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112。

④ 樂史：《太平寰宇記》卷一百六十四《梧州》，北京：中華書局，2007，頁3143。

⑤ 《橘錄校注》，頁24。

《長詠》沒有提到苔蘚，而提到另外的兩種病害，即青瘟和黑瘟，不過對這兩種病却束手無策。“襍瘟甚歲饑（橘忽有堅小而青黑者，謂之青瘟、黑瘟，往往祝祭禳祈焉）”。《長詠》也提到了整枝，同時配合刪葉，但却似與防治苔蘚無關，而是爲了提高柑橘的產量和品質。“採橘後，即芟去小枝不能結實者，謂之科樹”，可以減少冗條對營養的消耗，而去掉的樹枝又是很好用作生火做飯的薪柴，至今如是，這便是所謂“科冗付蒸炊”。打葉可以便於通風透光，“橘得日則色亦深而味甘”，所以要“向陽刪密葉”。《長詠》中也采用了和《橘錄》中一樣的治蟲方法，並給出了一個專門名詞“討蟲”，“樹有蠹則實不蕃，春夏用小鑽鑿取而殺之，謂之討蟲”，討蟲不能一蹴而就，必須反復多次地進行，故詩曰“討蟲煩鑽鑿”。於此看出，《長詠》對於柑橘病蟲害的防治，其實更爲細緻。需要指出的是，這種討蟲方法至今仍是一些傳統橘區，如筆者家鄉江西新干三湖橘農所采用的治蟲方法。

3.5 澆灌

唐人王旻在《山居要術》“種橘法”條提到的橘樹施肥方法：“十二月內，將橘樹根寬作盤，澆大糞三次。至春水澆二次，花實必茂。”^①這種方法一直在後世仍有使用。《橘錄》提到：“園中貴雨暘以時，旱則堅枯而不長，雨則暴長而皮多拆，或瓣不實而味淡，園丁溝以泄水，俾無浸其根，方亢陽時，抱瓮以潤之，糞壤以培之，則無枯瘁之患。”^②這裏提到排灌和施肥兩項內容。其實在“種治”一節中已提到了相關的內容，如“方種時，高者畦壟，溝以泄水。……冬月以河泥壅其根，夏時更溉以糞壤，其葉沃而實繁者，斯爲園丁之良”。^③在澆灌方面，《橘錄》強調灌排結合，以排爲主。而《長詠》似以灌溉爲主。其曰：“穿井防天旱（橘樹夏遭旱，則冬不耐寒而死，人家皆鑿井於樹旁，貴負荷之近也。熙寧七年大旱，井泉竭，山中擔湖水澆樹，有一家費十萬錢雇人者）。”對排灌的不同重視，可能與兩地特殊的地理環境有關。洞庭山雖然四面是水，但却易受旱，而且“橘樹夏遭旱，則冬不耐寒而死”，於是當地橘農采取了打井抗旱的辦法，用以解決水源問題。

① 王旻：《山居要術》，頁114。

② 《橘錄校注》，頁24。

③ 《橘錄校注》，頁23。

3.6 採摘

《橘錄》指出採摘分不同批次，有的爲了迎合市場需要，“歲當重陽，色未黃，有採之者，名曰摘青”。而所有橘子都需“經霜二三日纔盡翦”^①。也就是說，初霜是橘子全部採摘的信號。溫州地區的初霜期出現在11月底，蘇州地區初霜期一般在11月上中旬出現。具體的採摘日還要考慮當天的天氣狀況，要在“天氣晴霽”時進行。

《長詠》以冬至(12月21—23日交節)10至20天爲採摘的臨界點。“揀選收藏日(採橘日以冬至前二十日爲候，凡得霜後及有西北風後，天色晴霽時，則家家採而藏之，無過冬至前十日者，過則爲寒所損，亦損明年樹矣)。”陳舜俞在另一首詩中提到：“丹包赤實破蒼顏，冬至都無十日閑(山客採橘以冬至爲候)，剩選黃柑留過客，天寒誰肯更尋山。”^②在寒冬來臨之前將果子採摘下樹，是老橘區的一個傳統，這樣做不僅可以避免果實凍害，也怕影響明年橘樹的生長結實。至今江西新干老橘區也有“柑橘不吃立冬水”的諺語，意即在立冬(11月7日或8日)前便要將柑橘果實下樹，否則就會影響明年的產量。《長詠》也提到提早採摘的情況，利用柑橘的候熟現象，延長柑橘的貯藏時間，“寄遠曾非選(寄惠遠惟未甚熟，而小者乃不壞，既黃而大者，不能久矣)”。

《長詠》和《橘錄》一樣強調採摘日必須天氣晴好，因爲“雨多則皮虛而大，不可久藏，謂之耗也”。今江西老橘區仍然將因雨水較多、柑橘果實較大、果皮較爲虛鬆的果實叫做“泡(耗)子”。

3.7 收藏

收藏從採摘日開始。爲了提高貯藏保鮮的效果，採摘時要注意“以小剪就枝間平蒂斷之，輕置筐筥中，護之必甚謹”，因爲破損致“香霧之裂則易壞”；又因爲柑橘“不便酒香”，所以《橘錄》提到收者竟日不得飲酒。“採藏之日，先淨埽一室，密糊之，勿使風入。布稻藁其間，堆柑橘於地上，屏遠酒氣。旬日一翻揀之，遇微損謂之點柑，即揀出，否則侵損附近者。”^③採取這樣的措施貯藏，可使柑橘的完

①③ 《橘錄校注》，頁25。

② 陳舜俞，《都官集》卷十四《書通濟僧壁》，頁5。

好率達到“十之五六”。《橘錄》還提到了另一種保鮮方法，“人有掘地作坎，攀枝條之垂者，覆之以土，至明年盛夏時開取之，色味猶新”。這就是現在所說的連枝掩埋儲藏法，這是一種奇特的保鮮方法。這種貯藏方法也先見於《長詠》，“滿把留長蒂（採橘必留枝蒂，成一掘三指，所以養橘，否則易乾）”。其實這種保鮮方法在唐已出現。皮日休《早春以橘子寄魯望》詩提到，“個個和枝葉捧鮮，彩凝猶帶洞庭煙”，與之相類似。《橘錄》指出了這種保鮮的不利之處在於“傷動枝苗，次年不生耳”。

《橘錄》注重提高貯藏保鮮率，《長詠》似更重視貯藏果品的品質。兩者所用的貯藏方法相似，《長詠》提供了一些細節，“盈箱藉短茨（破竹爲籠，藉用短茨）。入倉寧愧稻，出汗僅同醫（採橘先制地板上，堆之數日，謂之入倉，微覆用草，使汗出，然後入籠，謂之出汗，否則味酢）。”《長詠》還提到了一種對所謂“脚橘”的貯藏方法：“熏藏品最卑（橘之小者謂之脚橘，山中作土窖，熏用煙而收之，謂之熏橘）。”

3.8 制治

制治，指的是柑橘加工。《橘錄》講到朱欒花、柑橘、金柑分別加入麝香、蜜、糖放入甌鼎中蒸、漬、熬、熏，加工成香料、藥橘和熏柑等的情况。

《長詠》中也提到藥橘和熏橘，但情況稍有不同。藥橘指對未成熟的落果進行加工，“初結實多落，收之堪淹藏，爲藥橘”；在江西老橘區新干三湖一帶，橘農也會將落果收集起來，用水浸泡，脫去落果中原有的苦味，加工成風味食品。

161

3.9 入藥

柑橘類果樹入藥部分主要在於橘皮，也有專門藥用的枳實。《橘錄》提到種植枸橘，朱欒代替枳實，也具有相同的功用。橘皮還是一味重要的調味品，北魏《齊民要術》在講到有關食品的加工和烹調所用的佐料中就多處提到橘皮。

《長詠》中除橘皮（殘皮）入藥之外，也提到以落果爲藥橘。其曰：“稍收先落子（橘生花至繁，初結實多落，收之堪淹藏，爲藥橘）。”當時的橘皮銷售十分火爆，因而出現“爭曬已殘皮”的局面。據“山中人言，東、西兩山賣乾橘皮，歲不下五六千秤”。

4 何以《長詠》的影響不及《橘錄》？

從上面的對比分析可見，《長詠》除有關柑橘品種的記載不及《橘錄》全面外，其關於生產規模、種苗來源、橘園開闢、病蟲防治、修剪培植、灌溉施肥、採摘要領、貯藏加工、運銷饋送、民風民俗，甚至果實大小、價格等等方面，和《橘錄》相比並不遜色，有些方面甚至是有過之而無不及。由此我們甚至可以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即中國傳統的柑橘栽培技術的主要環節，甚至是一些細節，在《橘錄》之前的一個世紀，甚至更早就已成形，並一直流傳至今。可是我們也不得不承認，《長詠》在歷史上的影響遠不及《橘錄》，以至於人們似乎不知有《長詠》的存在，甚至對陳舜俞的知道也不多。這是為什麼呢？

首先是體裁。《長詠》采用詩歌體裁，《橘錄》采用譜錄體裁。詠橘詩最早也最流行的一篇當屬戰國時屈原的《橘頌》，該詩借物抒懷，“皆（屈）原自喻其志節之意”，遠不及陳舜俞《長詠》一首客觀真實，但二者的流行程度却正好相反，可見人們對於文學作品的偏好，也是屈、陳二人在文學史上地位的反映。中國的詩歌創作，自《詩經》、楚辭以來，經過漢魏的發展，到唐時已達到了其巔峰。宋承唐餘緒，在詩歌創作的數量上有所超越，全唐詩有 48 000 多首，全宋詩有 60 萬到 70 萬首，但在質量上宋詩始終未能走出唐詩的陰影。“一切好詩，到唐已被作完”（魯迅語）。多而平庸，導致很多宋詩作品被埋沒，而無人提起。宋詩在中國詩歌史上的地位，既不及唐詩，也不及宋詞。

在中國詩歌創作由極盛轉向平庸的時候，譜錄著作則呈現出方興未艾的趨勢。這種體裁以記錄某一特定事物見長，尤以植物類譜錄為多，因有歐陽修、蔡襄等文壇領袖倡道於前，韓彥直等人繼起於後，迎合了世人對於格物致知的需求，直到明清時期仍然為人所仿效。而《橘錄》等書也因之受到廣泛的重視，除了多次雕版重印之外，新出之作也復不少，如明王象晉《群芳譜·果譜·橘》、清屈大均《廣東新語·木語·橘柚》、清諸匡鼎的《橘譜》、朝鮮鄭運經《橘譜》等。

其次是體量。《長詠》只有《橘錄》的約三分之一。收錄在陳舜俞文集《都官集》中，從沒有單獨流傳過。《都官集》係陳舜俞歿後，其婿周開祖所編，凡三十卷，原本久佚，現存《都官集》是清人編《四庫全書》時從《永樂大典》、清人《宋詩紀

事》、《橘李詩係》等書中輯錄，厘爲文十一卷，詩三卷。今查《紀事》、《詩係》二書，似不見有《長詠》一詩，由此推斷該詩當出自《永樂大典》，可見該詩在史上流行不廣。今人編纂的農史著作也均未提及。相比之下，《橘錄》的流傳較廣，雖然韓彥直也有文集《水心鏡》問世，凡一百六十餘卷，但已失傳。《橘錄》更多是以單行本的方式存在，並有多個版本流傳於後世，還被譯成外文，介紹到了國外。^①

從文學價值而言，宋詩的地位似不及唐詩，但宋詩也有自己的特點，特別是就內容論，宋詩較唐詩更爲廣闊。“凡唐人以爲不能入詩或不宜入詩之材料，宋人皆寫入詩中，且往往喜於瑣事微物逞其才技。”^②陳舜俞的朋友蘇軾就有詠人參、地黃、枸杞、甘菊、薏苡等所謂“小圃五詠”。陳舜俞的同時代人孔平仲也有《詠橘》一詩：“古人詠橘夸甘香，獨我愛此千樹黃。燭龍銜珠出扶桑，圓苞簇簇浮朝霜。誰家金餅籬內掛，一夜火圍林際光。折來便好命佳客，玉壺況有榴花漿。”據查宋人作過詠橘詩的還有蔡戡、袁燮、劉子翬、方一夔等。陳舜俞的《長詠》一詩很好地體現了宋詩的特點，雖然其在文學史上的地位或許不高，在科學史上的影響也不及後來的《橘錄》，但其對於柑橘諸多方面的細緻描述，對於瞭解《橘錄》之前，中國柑橘的歷史，仍然是十分難得的，是研究中國柑橘史的重要原始文獻。就農學史研究而言，據筆者有限的經驗，宋詩的價值也要高於唐詩。

Poetry and the History of Citrus:

Interpreting a Long Poem

Zeng Xiongsheng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the Natural Sciences

163

In a long poem, Chen Shunyu 陳舜俞 (d. 1075), a poet of the Northern Song dynasty, provided many details about citrus cultivation in the Dongting Mountain area near Taihu Lake. In the first extended study of the poem, the author of this article compares its content with the monograph entitled *Yongjia ju lu* 《永嘉橘錄》 (A chronicle of the oranges of

① 韓彥直撰，彭世獎校注：《橘錄校注·前言》，頁7—8。

② 繆鉞：《詩詞散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頁37。

Yongjia) written by Han Yanzhi 韓彥直, a local official of the Southern Song who lived in Wenzhou. A hypothesis is offered: Chen Shunyu, who exhibits a fine understanding of citrus—in some ways finer than Han's—grew up in an area where oranges were cultivated. While his poem on oranges is a very important document in the history of Chinese citrus, it has been far less influential than Han's work, possibly due to its genre.

Keywords: Chen Shunyu, Han Yanzhi, citrus, poetry